

阿蘭達蒂·洛伊：移動的共和國

作者：陳韻 來源：西天中土網站

本文源自陳韻與阿蘭達蒂·洛伊的一場對話，時間為 2011 年 8 月 27 日，新德里的下午。

我的一位來自南印度的朋友說，她過去十年裡讀過的唯一一本小說是《微物之神》。2006 年 4 月出版的中譯本“作者簡介”是這樣寫的：“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印度作家。十六歲時離家，隻身來到新德里，在學校主修建築；畢業後做過記者、編輯，後從事電影文學劇本寫作。三十七歲憑藉《微物之神》成為第一個獲得全美圖書獎，英國文學大獎‘布克獎’的印度作家，震驚世界文壇。”這段相當平時準確的描述，是中文讀者對這位至今只寫了一部小說的印度作家所知道的全部。而 2006 年，距離這本書寫完的 1996 年，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阿蘭達蒂的生命和寫作當然沒有在這戛然而止的“震驚世界文壇”之後休止，只是為曾經喜愛這部小說的中國讀者所不知，也無從想像。

當我站在 8 月新德里的烈日下，在 Jor Bagh 地鐵站出口等待阿蘭達蒂的時候，我回想著這次見面的來歷。6 月我在國內看到《國際先驅論壇報》上對阿蘭達蒂的新書《破碎共和國》（Broken Republic）的整版訪問，感到既吃驚，又不夠。7 月到德里後，我發現阿蘭達蒂突然離我很近：她是我朋友的老朋友，而幾乎身邊的所有人都是她的讀者——不止是 15 年前的那本小說，而是今日最重要報紙的專欄時政評論。而此刻，在 JorBagh 往北三站地鐵處，一場被認為從未出現過的絕食反腐抗爭正調動著印度全國上下的激情——至少在電視中和在德里地鐵裡，你能感受到。而在這場知識界劇烈的討論中，阿蘭達蒂·羅伊的

文章又是所有陣營交鋒的中心之一——你可以不同意，但你必須知道她說了什麼。支持者認為她看清了印度中產階級和右翼民族主義者在進行政治動員時的虛偽，他們同大企業和大資本家的勾結，以及對底層人民在任何時刻的排擠；而反對者則認為她從來拒絕對新情況做出新分析，只是帶著慣常的思維否定一場帶有群眾基礎的政治運動所開啟的希望。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為她贏得了榮譽的小說寫作被放在一邊，她關心現實政治中的話題，關心印度那幾百個大壩給環境和居民帶來的威脅，關心毛派武裝運動，土地問題，以及私有化等。她放棄虛構而追求紀實，而她的紀實與評論（包括最近一次深入毛派運動核心地區的探訪）在印度國內所引發的爭議，早已遠遠超過她那本震驚世界的小說。

就是這樣一個仿佛在獲獎之後果斷割裂乃至搗毀了自己已然成功的某一部分生命，而走向另一種公共的、反對的人生的女性，當她搖下車窗時，顯得如此深邃、瘦削、飽滿而年輕。《微物之神》的那股氣息迎面撲來，但我立即想起朋友的忠告：現在，人人都想採訪阿蘭達蒂。

陳韻：當舒達（Raqs 媒體小組的藝術家）給我你的聯繫方式的時候，我真是高興極了。沒想到你們已經是二十年的朋友了，在你變成一位有名作家之前你們就認識，而且至今還在爭論。我是去年 3 月第一次為“從西天到中土”（West Heavens）專案來印度的時候認識的他。順便說明一下，“西天”其實是中國以前指代佛教印度的名詞。

阿蘭達蒂：我們都在天底下！

陳韻：是的，但想像不同。現在，我們把“西天”這個詞複述化，這樣我們對印度就可以有多重天，而非一重天的想像，也不用像我們以前對待歐洲或美國那

樣“執著”。我今天也準備了一些問題，第一個方面關於文學，或者說是虛構類小說。這也是你最為中國所知道的那一面。你的《微物之神》2006年就翻譯成了中文。你這裡有中文版麼？

阿蘭達蒂：我有臺灣版，但沒有大陸版。

陳韻：當時這本小說很暢銷。

阿蘭達蒂：真的麼？

陳韻：是的。後來我告訴印度朋友《微物之神》在中國很受歡迎，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問我：你覺得中國讀者可以瞭解這裡面的細節麼？

阿蘭達蒂：關於《微物之神》最有趣的是，人們往往認為人們往往自信自己是最理解這本書的……或許是這本書流露出的親密感給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觸動，而且是用很個人的方式。

陳韻：觸發你開始用英文書寫這樣一個故事的靈感是什麼？

阿蘭達蒂：語言在印度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在很多情況下跟中國截然相反。印度的語言和方言多如牛毛。以我的家庭來講，我母親來自喀拉拉邦，她講馬拉雅拉姆語；我父親是孟加拉人（指孟加拉地區，包括今天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母語是孟加拉語；我在泰米爾納德邦上學，那裡講泰米爾語；我在德里上大學，第一任丈夫來自果阿，講孔卡尼語；第二任丈夫是旁遮普人……我們唯一共同的語言是英語。

但是《微物之神》裡講的是基本的政治直覺，你知道，這真的是形成於你還年輕時候的某些經驗。很奇怪的是《微物之神》之後，我寫了那麼多的非虛構的政論文章，可是直到今天，我覺得自己仍然處在介於議會左派和他們所謂的極左派之間的那個不舒服的區域。我還是在問那些同樣的關於印度種姓制度和性

別政治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印度的共產黨還沒有能力發問。這是《微物之神》所涉足的領域。但對我而言，小說還涵蓋了更多，它關於一切，植物，甲蟲，蜘蛛與河流，愛，希望和狂野地想像，關於試圖理解我們所生活的社會，這社會所製造的歷史，我們曾經藉以探路的情感地圖。

在寫這本小說之前，我學習的是建築，後來我在電影業工作，確切地說，我曾是一名演員，接著又給劇情片寫劇本，設計電影佈景。但當時的所有這些工作都不能達到我真實感覺到的那種深度或力量，我還在學習那些技術，學習如何講故事和如何思考的技巧。電影的工作也並不能真正滿足我，我好像在保留自己的真實思想，等待我可以真正表達的一刻。

陳韻：就像自我訓練。

阿蘭達蒂：就像跑步，在你跑馬拉松之前你要先熱身。

陳韻：你的電影經歷如何？

阿蘭達蒂：我第一次出演的那個電影，我既不喜歡那個片子也不同意它的政治觀點。

陳韻：那是那一年？

阿蘭達蒂：1981年，在德里。我在喀拉拉長大，但後來逃離家庭，一路北上。我進入建築學院後就不回家了。我自己打工掙錢讀完大學。而第二部電影更接近我的想法，關於建築學校的學生。第三部電影是對西方兜售東方的諷刺。但是，你知道，電影工作就是要跟許多人合作……但我想一個人幹，做一件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的事。我寫《微物之神》，只有我和我的作品。我也不給任何人看。我也不跟任何人說。我就坐下來寫。

陳韻：你開始寫的時候就把它當做自己的秘密？

阿蘭達蒂：他們知道我在寫東西，但我沒給他們看，直到我寫完。那是 1996 年。《微物之神》花了我從 1992 年開始的 4 年時間。

陳韻：但寫完之後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小說家了。你覺得這種他人對你看法的突然轉變意味著什麼？因為之前人們知道你是從電影領域，而你一夜之間以另一個身份出現。

阿蘭達蒂：從很多方面來講，這都是一個美麗的國家，發生著許多驚奇，以及很多醜陋。我的書出版的時候，印度右翼正開始上臺執政。印度當時正把自己放到一個新的“超級大國”位置上。我獲得布克獎的“成功”被同這一巨大的超級民族主義操作所收編。

陳韻：你變成了這一宏大敘事的一部分。

阿蘭達蒂：是的，民族主義敘事的一部分。我是所有主流國家雜誌的封面人物，這從一方面來講還挺好的，但很快我開始感到極端不適。幾個月後，他們進行了核子試驗。我寫了一篇文章譴責這場試驗為“想像力的終結”。我撰文反對這種醜陋的民族主義，這類叫做“印度教”（Hindu）自豪感的無稽之談——於是我又在一夜間從童話公主變成邪惡的叛徒。在那篇文章裡，我說如果反對核彈就是反印度和反印度教，那麼我退出，我自成一個移動的共和國。我說對那一套東西，我一點都不信，他們卻對我暴跳如雷。那就成了右翼中產階級對我動火的發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開始寫一些關於大壩，關於自由市場的危險和自然資源的公司化和私有化等問題。我寫了 911 和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本來人們期望我作為一個小說作者而被慶祝，而突然之間.....

陳韻：就進入了骯髒的現實。

阿蘭達蒂：沒錯。十年後，我寫了 5 本非虛構書籍.....

陳韻：所以你是有意識地實踐自己從小說到非虛構的寫作的麼？

阿蘭達蒂：這要看具體情況。當核子試驗發生的時候，我感到什麼都不說的政治性，和說點什麼的政治性是一樣的。如果我沉默，我就會令自己陷入某種牢籠——這是作者的噩夢。當然，做一個受歡迎和讚譽的作家是很快樂。但如果你只是想成功和受歡迎，那就更像是政治家而不是作家了，不是麼？

陳韻：但你是否會認為自己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鬥士？逆某種潮流而動是重怎樣的感覺？

阿蘭達蒂：並不總是逆潮流，這只是精英喜歡的看待方式罷了。他們認為自己的聲音就是國家的聲音。誰背叛他們的利益就是叛徒，就是反國家。他們佔據意見，佔據金錢，佔據電視頻道，佔據公司，佔據一切，因此突然之間他們就開始認為自己是印度了，但他們不是。

陳韻：但你是否會認為你今天的立足點同你年輕時候相比逐漸有了演變？因為今天特殊的時代情況？喀拉拉邦是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地區，我們都知道今日印度的左派運動同你長大的喀拉拉的知識資源有關。你的父親又是孟加拉人，而孟加拉也曾經歷了長達 34 年的共產黨執政，直到今年才徹底失勢下臺。同時孟加拉地區還是印度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策源地。你是印度左翼知識份子路線的成員麼？抑或不是？

阿蘭達蒂：《微物之神》剛出來的時候，左翼對我很憤怒。

陳韻：為什麼？

阿蘭達蒂：因為對共產黨的批評——對當地的議會馬克思主義路線共產黨。

陳韻：的確。

阿蘭達蒂：我在小說中批評他們沒有能力理解種姓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印度社會獨有的，卡爾·馬克思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甚至直到今天，也沒有能力對此處理。他們只能喊喊類似於“種姓即階級”之類的口號，但情況不是這樣。你看，共產黨的大部分領導都出身上層種姓。

陳韻：這倒是。

阿蘭達蒂：因此我總是感到不舒服，因為無論是關於性別或種姓，我不屬於任何正當路線……我不能說我屬於這個黨或那個黨。

陳韻：我看了你最新一本關於你所親身經歷的毛派運動的書《破碎共和國三書》（*Broken Republic: Three Essays*）。你似乎進行了一項田野調查，真實進入了部落和樹林，同毛派武裝在一起，雖然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你至少把自己打開，暴露在另一種生活和鬥爭裡。你是怎麼想到自己必須到那裡去的？

阿蘭達蒂：“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1967 年在西孟加拉邦成立，當時叫“解放黨”，成員被叫做納薩爾派分子（*Naxalites*），因為第一次起義發生的村子叫納薩爾。今天的印共毛派是多年來諸多黨派分分合合的結果，他們在印度中部山區大規模復興，那裡居住的是部落原住民。他們的土地被印度政府簽約出售給各種公司和跨國企業，用於採礦和基礎設施開發。那裡正在戰鬥。毛派有一個“人民解放遊擊隊”，在恰蒂斯加爾邦（*Chhattisgarh*）這樣的地方鬥爭非常激烈。兩年前，印度政府宣佈開始綠色搜捕行動（*Operation Green Hunt*），清剿毛派分子，並把土地清理乾淨用作採礦。六百個村莊被清空。成百上千人逃離家園。有些人跑去路邊的員警帳篷。幾千人躲進叢林。許多人加入了毛派。去年 2 月，我家門縫下塞進一片紙。這片紙來自毛派，邀請我去樹林。

陳韻：所以你受到了歡迎。

阿蘭達蒂：是的，歡迎，不是“印度恨你”，而是被展開雙臂地歡迎，紅色的時候。

陳韻：所以當你真的走進時，如你在《與同志共行》那一部分裡寫的那樣，這段經歷將你帶入了叢林深處的真實世界。這個世界不是關於浪漫和神話的，而是血雨腥風，暴力橫行。事實上關於戰爭的概念，可能在印度內部都還不願意承認。你可以說這是衝突、叛亂，但一旦你反復強調和確認這是“戰爭”，就變得更富於政治性，更加嚴重，這也是令我震驚的部分。

阿蘭達蒂：我認為那裡發生的的確是一場戰爭，有 20 萬准軍事部隊包圍在那裡——灰狗，眼鏡蛇，蠍子——都是各種安全武裝的名字，而且這不止是人們開槍爆炸的戰爭，人民，那些可憐的村民被重重包圍。他們不能走出樹林，也不能得到藥物。所有這一切。他們深陷困境。但除此之外，這是一場有戰術、有策略的戰爭，在任何層次上這都是戰爭，一場文明的戰爭，想像的戰爭。有些人指責我把那裡的情況“浪漫化”，而我覺得如果你無法看到其中的浪漫，那才是真正可悲之處，因為那裡有浪漫：極度貧困的人們，站在世界上最有錢的公司面前，說“夠了”。有趣的是，在樹林裡面卻沒有部落社會的浪漫化。毛派在過去對待自己同志中的女性是極端家長制的，現在他們很注重女性身上發生的情況。差不多一半的遊擊隊武裝隊員是女性。

陳韻：我能感到在這場反對政府陣的陣營內部，在宗教內部，存在著不同層次的鬥爭。因為存在著革命內部的被壓迫者。

阿蘭達蒂：完全如此。問題是，印度女性主義運動發生了什麼？它被 NGO 化了。那麼多國際資金跑進來資助婦女工作。譬如要是你談婦女墮胎，性別問題或愛滋病，這些領域裡資金充裕，因為它們不會威脅女性經濟的結構。因此女

性主義運動就主動退縮到這些領域裡。但是如果你討論因為修築大壩而牽涉到的安置費，政府只發補貼給所有男人，而那些幾百年來土地的共同擁有者——婦女，卻一分錢都拿不到……而 NGO 女性主義者對這些話題一點都不碰，因為這威脅到支撐全球金融的經濟。

陳韻：你對民族主義問題一直相當警覺。

阿蘭達蒂：這個問題很複雜。在一個國家反抗殖民統治的時候，民族主義不是壞東西，但在它拋開殖民主義之後，民族主義就變得醜陋了，一搖起民族大旗就不再關於包容，而是關於排斥。像印度教主義就是關於什麼是真正的印度，穆斯林就不是真印度了，那些不同意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人就統統是反國家的了。這一切就變成內部殖民。一個符號的意義取決於你何種情況下使用。同樣地，我認為真實發生著的鬥爭的浪漫，同被歪曲講述出的故事的浪漫不同。印度獨立鬥爭的整個故事都是被扭曲成配合中產階級和印度教主義分子口味的版本。我的意思是，印巴分治是怎麼開始的？所有故事的再講述都充滿了不真實，那經常發生。因此喪失理解或感受浪漫的能力是信仰所不能及的悲劇，因為你已經變成了一個會計師國家，革命變成了算帳和收支平衡表。

陳韻：你剛剛提到一點，結構性變化現在似乎變成了不可能。例如，某種政治如何實現，部落人民的權利如何實現，這在既有政治體制裡好像沒有達成的通道。是不是因此，暴力就無法避免？否則，這些人群就要永遠被壓迫，永世不得翻身。關於印度獨立的一個最美妙的故事是我們所相信的“非暴力”。

阿蘭達蒂：印度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國家之一，非暴力的神話完全是扯淡。印度教中每個神都很暴力，每個神都有武器，而每段經文都鼓吹不平等，他們創造

種姓。他們說這個人是賤民，這個人不可觸碰，等等。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在這些東西面前說“非暴力”。

陳韻：至少，我們可以說存在一種非暴力的努力？譬如甘地的傳統。你覺得這一傳統是否曾經奏效？它在今天又處在什麼位置？

阿蘭達蒂：關於甘地的某些東西很了不起。他關於消費和持續性的想法相當重要與超前。但是他的某些想法我認為也很暴力。譬如，每個人都認為甘地挑戰了種姓制度，但是他並沒有。他說我們需要尊重所有種姓，但種姓制度是樣好東西，人們必須做他的種姓要求他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想打破現狀，那麼你當然不會暴力，因為每個人都會開心。而真正的問題在於今天。我的意思是，英國人在 40 年代末期已經徹底完蛋了，被戰爭搞得一窮二白，搖搖欲墜。甘地是許多將其推翻的人之一，但是倘若在歷史上，英國人處在不同的時間節點，非暴力還能管用麼？我不斷地問這個問題。印度中產階級談論非暴力，每個人都說安納·哈紮爾（Anna Hazare）運動——要求政府通過宣稱是“人民的”反腐敗法案（Jan Lokpal Bill）——是非暴力的。為什麼它是非暴力的？因為員警太怕他們了，不敢輕舉妄動。這是同一個國家，在恰蒂斯加爾屠殺人民，在喀什米爾屠殺人民，在曼尼普爾屠殺人民，而且恣意屠殺——但這個國家卻被中產階級嚇壞了。所以他們必須是“非暴力”的。因此如果你是安納·哈紮爾，中產階級都簇擁著你，商業電視臺都資助你絕食，那還挺有幫助；但如果你是別人，某個部落人在他自己的村子絕食，誰管你呢？哪些人無論如何都在絕食，他們總是饑腸轆轆。他們不能再絕食，因為體重不夠。你必須驚人健康並妥善照料好自己才能絕食。如果你已經營養不良或疾病纏身，你就不能絕食，因為你兩天之內就會死掉。

陳韻：不遠處正在進行的這場運動就沒有為人民打開另一條參與政治的管道

麼？阿蘭達蒂：這是一場右翼政變，就是這樣。我在《印度人報》

（TheHindu）上的文章《我寧可不作安納》裡說了兩三件事。一件是，首先安納·哈紮爾歷史上就同印度教原教主義法西斯組織衛隊（RSS）有關。他身邊的人同所有那些反平等化運動有關。他們都是上層種姓，城市商業主，是衛隊組織在進行動員。每天情況都日漸明朗。但是另一件事情是所有那些醜聞，2G 和英聯邦運動會以及所有腐敗案件的發生——是誰在腐敗中賺錢？是大公司。但關於這些人卻隻字不提。大公司經營電力、水、教育、健康、電信、道路，這些以前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真的關心腐敗，為什麼不把 NGO，大公司和媒體一併攪和進來？但是你把他們放在一邊，你每天都有公司資助的電視頻道廣播日以繼夜地廣播你的革命，而那些大公司異口同聲指責政府如此腐敗，鼓吹進一步私有化。

陳韻：這是他們的主張。

阿蘭達蒂：他們就是這麼說。20 年前，政府自己說我們如此腐敗，需要私有化，腐敗是制度性問題，我們必須自由化。但我們私有化了，腐敗更嚴重了，然後他們說我們必須進一步私有化。這是什麼邏輯？

陳韻：但你的這個觀點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麼？譬如，那些走向廣場和舞臺，在電視上展示他們對安納的支持的人們，他們難道全都是中產階級麼？

阿蘭達蒂：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城市居民，但無論如何都是被 RSS 和印度人民黨（BJP）組織起來的。電視臺和媒體叫囂著穆斯林恐怖主義者和毛派恐怖主義者，那些對人民滿懷敵意的人，現在卻日日夜夜地支持這場“革命”。為什麼？這是一種政變。建立起一個巨大的反腐敗機構，擁有統攝從總理以下所有

人的巨大權力，擁有監督權，調查權和司法權，還有懲罰權——這是顛覆這個混亂民主的技術-司法方式.....失敗的民主.....這是右派政變。他們說這是治癒令人絕望的腐敗的良藥。但是沒人仔細看貼在藥上的標籤。藥比病還要危險。

陳韻：如果是政變，那它不會將印度政治引向另一階段麼？

阿蘭達蒂：是的，它還在協商中，因此我們還要觀察。好事是突然間在過去的三四天內，人們開始理解正在發生什麼了.....

陳韻：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非暴力。

阿蘭達蒂：首先警方在安納·哈紮爾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情況下逮捕了他，然後又釋放了他，但他拒絕離開監獄。所以他們把他留在監獄，允許拜訪者讓他接受電視訪問，採訪畫面全國轉播。然後他們讓他在監獄裡多呆了三天，而運動卻愈搞愈大，接著他們準備了蘭姆力拉廣場給他，他可以站上舞臺表演絕食。好像政府在竭力做這一切以便把自己搞垮。

對印度中產階級來說，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恰蒂斯加爾的樹林裡麼？如果你示威遊行，你會被射殺扔到河裡。印度的民主是什麼？民主是給精英的。所有地方都像封建統治，你知道麼？

陳韻：但是過去三四天內發生的事件，讓人們開始意識到真正發生的事情，也是他們自我教育的過程麼？

阿蘭達蒂：這個國家所發生的無止盡的複雜化，把我們每個人都搞得很忙。譬如，為什麼生活在這裡這麼有趣？對寫作者來說這裡很真實。轟轟烈烈的對話和辯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

陳韻：永遠都不缺少靈感，永遠都不缺少動筆的熱情。

阿蘭達蒂：對。

陳韻：很有趣。在你的《破碎共和國三書》中引用了很多毛派遊擊隊員創作的詩歌和歌曲，對我來講那些樹林裡的故事就像電影場景一樣生動。毛派曾說“中國的（毛）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而你在回溯這段印度早期共產運動的歷史時，還提到印度馬克思主義思想者和印共領導人查魯·馬宗達（Charu Mazumdar）。

阿蘭達蒂：對中國人來說聽到這個可能會覺得奇怪，因為毛主席是中國人，他相信中國是宇宙中心，所以他的政治立場是建立在這一點上的。但印度的毛派也相信中國是宇宙中心，所以有時候聽起來會有點荒謬。譬如假設你 1967 年、68 年在西孟加拉，你建立了自己的印共（馬列主義）政黨，你的鬥爭精神來自北京廣播，中國有它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為了他自己的原因而支持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人在東孟加拉搞大屠殺，而孟加拉毛派，當時被稱作納薩爾分子，以政治性自殺的方式支援中國。那個時候在孟加拉地區誰會高興呢？於是處於策略考慮——不要管道德考量問題，因為道德問題也適用於中國——你怎麼可以支持波爾布特和在孟加拉發生的任何事情呢？但是這些人就是這麼做的。因此一切都被扭曲了，你不是站在你自己的位置思考問題，從一個原則性或革命性的思想出發，將自己同別人聯繫起來。你知道，那是印度共產黨長期以來的問題，除此以外，他們還不瞭解種姓。

陳韻：我在過去兩個月以及之前兩次訪問印度的經驗中，發現左派思想對印度一代代知識份子產生了深遠影響，某一代印度人從 60 年代的革命現實中成長起來，至今保持著對民族國家的警惕。但另一方面，真正長期共產黨執政的邦只剩下喀拉拉一個，而喀拉拉的歷史和經驗又同印度其他地方完全不同。是否

印共自身在意識形態、思想觀點或策略上有什麼不足之處？或這同他們和民族國家的建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關係有關？

阿蘭達蒂：我認為有很多原因。當一場運動決定成為議會選舉政黨的時候，也就是當印度共產黨（CPI）和印共（馬克思主義）（CPM）決定那樣做的時候，他們立即著手同時成為管理者和革命者，但這很難。另一方面，我認為他們不理解精神領域，不理解種姓制度。我反復地這麼說，因為種姓是中心，是引擎，是印度政治的核心，如果你不懂這一點——他們如果理解的話也是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印度教徒並自己實行種姓制度，共產主義者都只跟屬於同一種姓的人結婚。他們實行種姓，但他們沒有處理它的理論工具。所以種姓制度最後就跟他們無關了，甚至毛派，他們也不知道。

陳韻：但是毛派運動現在火熱的地區裡，部落原住民原本是沒有種姓的，是不是這就是他們的鬥爭可以奏效的原因？

阿蘭達蒂：對，部落是一個單質社會，所以容易些。否則的話，毛派鬥爭就很難。他們嘗試處理種姓問題，但問題是你不真正地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你就沒有處理它的位置。

陳韻：但是你看到在安納·哈紮爾那裡，他們似乎以很體面地方式處理種姓制度……

阿蘭達蒂：在印度，種姓是分隔人們的完美辦法，因為甚至賤民內部還有那麼次級種姓的劃分。印度社會完全是中國反面，中國漢族占絕大部分。而印度每個人都屬於某個少數族群——宗教的，種族的，種姓的或者語言的。所以作為統治階級要分隔人民，並分裂他們總是容易的。

陳韻：你是說權力在任何層面，任何地點和時刻，若要執行，都是容易的。

阿蘭達蒂：正是如此。

陳韻：但當你無法團結起人們的時候，如何讓他們相信這是一個成功的國家，如何發出民族主義呼聲呢？

阿蘭達蒂：你所看到的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大部分是只在城市裡才有的，多數是中產階級。這是印度教右翼試圖創造出來的票倉“多數”。這跟法西斯主義有關。但是全國上下人們都在以不同方式鬥爭，不止是毛派，他們對剝奪他們土地、村莊、河流和山林的行為進行鬥爭。

陳韻：所以在印度這種本地抗爭到處都很強烈，遊擊隊到處都是。

阿蘭達蒂：到處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人們總能找到鬥爭的辦法。

陳韻：這同共產黨的存在有關係麼？

阿蘭達蒂：同時，印度還要維護他作為一個巨大的民主國家的聲譽。因此它不能公開做斯里蘭卡做的事情，幾個月之內幹掉四五萬人。過去二十年間，喀什米爾死了七萬人。現在政府計畫動用地面武裝和空軍，來消滅印度中部的毛派。這已經變成一個員警國家了，除非他轉變自己的想像。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

陳韻：你認為這種在想像上的轉變會發生麼？

阿蘭達蒂：我不知道。這個轉變不會發生在上層。製造出問題的想像不會解決問題。

陳韻：謝謝。